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香港分会主席郑培凯—— 在传统文化的渡口撑一支长篙

■ 本报记者 张苗 陆遥

见到郑培凯时,这位76岁的文化史家,身着白色唐装,坐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教室里,与30余位同学围坐成一圈,边吃盒饭边交流。

郑培凯说话的音量不高,但中气很足,吐字清晰饱满,直送到每个人耳边。他是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香港分会主席,是笔名“程步奎”的诗人、书法艺术家,也是金庸的“看戏第一知己”、李安电影的“文化把关人”,此刻的他更是一位和蔼的文化摆渡人,为年轻后辈们的青春困顿答疑解惑。

从青岛到台北,从纽黑文到香港,他始终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渡口,撑一支长篙,载着文化的薪火,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跨界治学的“文化底气”

每一位和郑培凯深聊过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学识渊博、真挚情感,以及无处不在的幽默感。“我家没有书房,书斋成了书籍的堆填区,功能就完全消失,既不能读书,又不能写作。”郑培凯用自嘲形容家中的几万册藏书。

藏书多,与他的跨越学术分界的治学史不无关系,郑培凯在明代戏曲、茶文化、陶瓷下西洋、电影的人文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典翻译等不同领域著作等身。“我的学术研究,表面上有着‘跳跃性’,内里有其相关的逻辑。”在郑培凯看来,这条逻辑就是要解决内心的知识困惑,要回答心底难以遏抑的求知欲望,想要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走向,“知道我活着到底有什么存在意义”。

大学时主修外语,博士阶段求学美国,教师生涯扎根香港,郑培凯为何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这与他的成长之路不无关系。

1948年,郑培凯出生于山东,幼年的他随着父母屡次搬迁,远渡台湾。动荡的时局并未切断家学的脉络,他的父亲写得一手好隶书,珍藏明拓本;母亲是戏迷,常带他出入戏园。褚遂良的书法与京剧的锣鼓点,成为他最早的文化启蒙。

进入高中,郑培凯发掘对文学的喜爱,特别是对西方文学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让他报考了台湾大学外语系。就是在台大,总到外系旁听课程的他,遇上了中文系名师叶嘉莹开设的《诗选》与《杜甫诗》。

“诗词的女儿”叶嘉莹是享誉中外的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她的课程让郑培凯流连忘返,让他犹如步入古典诗词的桃花源。

在郑培凯看来,叶嘉莹先生对他最大的影响,不只是在学术的开导,更在为人处世——从古典诗词中汲取人生智慧,融会贯通,如此面临生命困境时,可以泰然应对。

1970年,郑培凯到美国夏威夷大学攻读历史,之后在耶鲁大学深造,成为著名汉学家、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史景迁的第一位博士生。师生情谊绵长——即便毕业多年后,每年春夏之交郑培凯都会去纽黑文看望史景迁,“之所以选择这个季节,因为他家那个大园子里的花木实在开得太漂亮,姹紫嫣红,跟昆曲里描写的‘游园’很像。”师生之约,一直持续到史景迁去世。

这样的经历塑造了郑培凯独特的视野,让他能以世界的眼光审视中国,又能以中国的底蕴对话世界。

寓教于艺,致力于年轻一辈的传承

在学术交流中,郑培凯总会留出时间与年轻人交流,“文化教育是人成长的基础。很多年轻人就是等着某一刻,当你点醒了他,他就对中华文化有了感触。”正如当年叶嘉莹先生对他的影响。

为了做好文化教育这件事,郑培凯在香港城市大学创建了中国文化中心。那是在1998年,刚辞去美国教职回到香港的郑培凯,成为该校中国文化中心首创主任。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项文化使命。

中国文化中心的课程是全校必修课,学分占所有课程的7%到8%,然而,当时他的诸多同事,特别是理工科老师表示了反对,“他们说浪费学生的时间,学文化都是虚的。”郑培凯模仿起一位朋友的质疑,“你看我在科学界这么有成就,我就没学过文化。”当时郑培凯给



郑培凯正在创作中。

受访者供图

不同方言,但同样的文字,这是我们的血脉。只要有汉字的地方,就是家乡。

——郑培凯

人物名片

郑培凯,祖籍山东日照,历任耶鲁大学、佩斯大学、台湾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校教职,曾任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现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香港分会主席,2016年获颁香港特区政府荣誉勋章,2023年入选福布斯中国杰出匠人TOP100。他在艺术思维、艺术创作、艺术欣赏、评论与文化思维的关系和文化美学等研究领域著书立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人和保护者。



郑培凯近照。

受访者供图

了他一个台阶:“你没学过,就让学生学点吧。”心里则满是吐槽:“你如果学点文化,成就更高。”

这是郑培凯初到香港推行文化教育时遇到的阻力。面对困难,他的话语柔软,但做事硬气,他尽力邀请到不同领域的学者、艺术家来学校为学生讲课。“越是入门,越需要大师。”这是郑培凯的坚持,也是中国文化的讲座常常爆满的原因,“这样的讲座与实践,要求实际从事特殊研究工作的专家,像画家一样,把他们融会贯通的知识,讲解给同学们听,让大家产生兴趣,拓展他们的文化视野。要达到这个目的,首要的条件是,大学者愿意放下身段,给初学者一个入门的机会。其次,同学要有开阔的胸怀,对自己不熟悉的知识领域有认知的兴趣。两相结合,则文化艺术讲座就能为青年学子打开一扇一扇新知的窗口,看到知识的天穹是多么辽阔,文化修养的乐趣则能如光风霁月,给人带来无限的欢愉。”

当然,作为多领域的大师,郑培凯也把赴各地讲学的时机,作为引导年轻人走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殿堂的机会。

在香港,他鼓励年轻人找到自己真正乐于探索的领域;在台湾,他与学生们探讨书法与古诗词的审美;在深圳,他与大学生们聊“艺术教育”的一脉相承;在杭州,他与浙大学生聊起苏东坡的坚守。

作为浙江大学客座教授,郑培凯每年都会来到学校与同学们交流。10月1日下午刚从香港抵达杭州,郑培凯就来到浙大紫金港校区,为了能多点时间与大家沟通,他谢绝了朋友的晚宴邀请,将盒饭带进教室。

沙龙的氛围轻松自在,心思落到哪

格。”“苏东坡写过《东坡八首》组诗,写他在黄州的生活,其中序里提到,他被贬到黄州两年了,生活实在凄惨,积蓄都用完了。因朋友马正卿帮忙,才在城东门外有几十亩荒地躬耕自足。第一年收获的麦子很好,他很高兴,自称‘东坡居士’,这个名号是浸润了血泪的。”

郑培凯对于苏轼的解读,疏解了同学们的情绪,也埋下了从历史文化中照应现实的种子,“文化教育的目的,不在于训练专业的顶尖艺术家,而在培养青年一代的文化修养与艺术品味。”在郑培凯看来,文化教育要与青少年成长的文化环境相符合,“从文化传承的具体艺术典范中吸取滋养,才能事半功倍。”

情难自持,为传统戏曲推广打开一扇门

每次到杭州,郑培凯的文化活动都排得满满当当。在沙龙之后的第二天,郑培凯在《经典的诠释与翻译》讲座上侃侃而谈;第三天,他来到浙江日报“紫藤花讲坛”,和浙江京昆艺术中心的演员们进行了一次圆桌漫谈,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大家围绕昆曲艺术的魅力和《牡丹亭》的情绪表达,相谈甚欢。

推广传统戏曲这件事,郑培凯在香港已经做了几十年。专业的文化讲坛、老艺术家的纪念活动、戏曲研讨会……总能看到他的身影。

这并不容易,香港市民对歌剧、实验剧的接受程度很高,留给传统戏曲需要慢慢品味的空间不算多。

在香港推广昆曲20多年,郑培凯深感社会中有一种“现代化无知的傲慢”,认为昆曲是过时的戏剧演出,又慢又无聊,故事也不接地气。昆曲太老了,教学生干嘛?

这是他在香港高校推广文化教育时面临的类似困境,“我们会赞扬西方有歌剧和芭蕾的艺术传统,认为他们善于保护传统,那么,我们怎么可以漠视昆曲的传承呢?”于是,郑培凯邀请昆曲名家与剧团频繁来港授课、演出,希望通过昆曲向学生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与

表演艺术有其高雅的一面,并不逊于英国文化和莎士比亚戏剧。

秉承这样的理念,他和香港昆曲研究家古兆申及香港的朋友,邀约了白先勇讨论如何向年轻人推广昆曲,开始策划如何让年轻一代欣赏《牡丹亭》的雅致。

后来的故事,相信许多人都有印象——白先勇联动学术界和表演艺术界精心打造的青春版《牡丹亭》红极一时,带动年轻人重新关注昆曲。

为什么是昆曲?这源于1992年郑培凯观看的一次演出。“那场演出来自上海昆剧团和浙江昆剧团,让我感受非常深。在我心目中,我觉得传统中国表演艺术是非常优雅、非常美丽的一种呈现方式,可那是在我模模糊糊的想象当中。”他坦言,观众对传统存在一定的文化隔膜,就连他自己也是,早年写现代派的诗、读现代西洋文学、喜爱现代戏剧。可是真正接触到传统中国戏剧最优秀的表达方式时,他情难自持,“它真的那么美,真的那么优雅,那么能够表达这些人物的性格,让我非常感动,我看的时候眼泪都下来了。”

浙江京昆艺术中心(昆剧团)的演员杨崑曾在2006年受郑培凯邀请,前往香港城市大学讲学。杨崑回忆说:“那时的郑老师,已经将昆曲的种子种在学生心中,当大家对我们的讲学反响热烈,我忍不住越讲越投入,超出了原定的时间。”

在郑培凯看来,昆曲是表演艺术,又不只是表演艺术,其中浸润了中国文化传统的诸多精粹,融合文学、音乐、舞台表演的审美追求。他这样看昆曲的地位——“许多人现在研究昆曲,称昆曲为‘百戏之母’,其实并不恰当。昆曲之前有北杂剧、南戏文等剧本与舞台传承,从宋朝开始就普遍存在。昆曲不是中国戏曲的‘母亲’,应该称为‘百戏之模’才对,是表演艺术的巅峰与模范。”

除了昆曲,文学、电影、茶道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郑培凯也十分喜爱,并乐于钻研。谈及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郑培凯充满自信:“文化传承需要时间,一代一代继承保护和创新发展。如今,变化是非常显著的,时间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郑培凯在浙江日报“紫藤花讲坛”。

本报记者 林云龙 摄

🔗 链接

中国式的深情神话

■ 郑培凯

《牡丹亭》是一部伟大的文学杰作,更是中国戏曲艺术中最璀璨的一颗明珠。

作者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江西抚州临川人,阳明学泰州学派大师罗汝芳的入室弟子,一代诗文大家。诗词歌赋卓有成就之外,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他的戏曲作品系列“临川四梦”,他也因此被文学史家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临川四梦”中的《牡丹亭》,又名《还魂记》或《还魂梦》,长达五十五出,剧情跌宕起伏,更以辞藻优美著称。

《牡丹亭》在明代万历年间甫一问世,就备受瞩目,使当时文坛与剧坛都惊艳不已。见多识广的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汤义仍《牡丹亭》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袁宏道则评点道:“《还魂》,笔无不展之锋,文无不酣之兴,真是文入妙来无过熟也。”都惊叹《牡丹亭》文辞美妙,是足以流传千古的文学经典。也有人虽然颂赞汤显祖剧本之文辞美妙,却也批评音律方面有许多不合乎“吴音”之处,与昆腔的水磨调有所扞格,指之为“此案头之书,非筵上之曲”,因而出现一些草率的改编本,“以俚吴歌”。

经过明清曲家的努力,以及舞台伶人的实践,以调整曲牌及集曲整合的方式,保持《牡丹亭》原作魅力,终于使其成为昆曲表演艺术中家喻户晓的保留剧目。

《牡丹亭》经历了四百个春秋的开花花落,人世沧桑,一直上演到今天,依然是最受欢迎的昆曲剧目,并在21世纪的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

要理解《牡丹亭》为何能在千百部明传奇中脱颖而出,成为最辉煌的戏曲杰作,必须从三个面向来把握:

首先,是思想内涵与文学想象。要知道作者汤显祖写作的历史文化背景、动机与寓意,以及他如何以美妙文辞构筑出他心目中的想象世界以及对自由开放的向往,才能深刻认识到这部作品为什么可以超越时代,让千百年后的人们为之感染同情,观之兴叹。

其次,是舞台表演的审美境界。《牡丹亭》不仅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也是在舞台上粉墨登场的戏曲表演,这就需要理解从南戏到昆曲的演剧传统,知道明传奇编剧与昆曲演出的互动关系,从而理解《牡丹亭》如何以诗歌演唱的写意手法,展示人间悲欢离合的百态,展示出中国舞台表演最精致优美的审美境界。

最后,是昆曲音乐的优美绝伦。《牡丹亭》在不同剧种中都可以演出,而最优雅的艺术呈现形式则是昆曲,关键是昆曲婉转细腻又优美动听的音乐,恰如其分,显示了《牡丹亭》的雅韵高标,辅以精雕细磨的“四功五法”,最能给人“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忘情感受。我总指出,昆曲在戏曲传统中能够独占鳌头,就来自其艺术跨界三结合的成就:剧本文学雅致如诗、舞台表演精彩如画、音乐优美细腻,三者合而为一,浑然天成,成就了中国传统演艺的巅峰,而《牡丹亭》就是最优秀的典范。

汤显祖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与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及生命思考是息息相关的。他的戏剧作品,呈现了不同角色的世间处境,同时揭示不同人物的自我选择,反映了人物性格、自主意志与生命意义的关系,也间接反映了他自己的理念,一生坚持自我的价值与意义。汤显祖在官场上的坎坷,与他本人的性格狷介有关,更与他性格中永葆艺术想象的天真有关。为了维护自身秉性的纯净,他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来对抗俗世的污秽。

在他的作品中,权相是批评的主要对象,官场是污浊不堪的场地,这在《南柯记》与《邯郸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至情”人物,坚守爱情与理想的角色,则是汤显祖歌颂的对象,这在《紫钗记》霍小玉身上已经可以看到,再到《牡丹亭》中,更为后世塑造了杜丽娘这个千古不朽的美丽形象。